



伦理与国际事务评论

第一辑

大国发展与国际道义

熊文驰 马骏 主编



伦理与国际事务评论

第一辑

大国发展与国际道义

熊文驰 马 骏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国发展与国际道义/熊文驰,马骏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伦理与国际事务评论; 1)
ISBN 978 - 7 - 208 - 08877 - 1

I. 大... II. ①熊... ②马... III.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中国—文集 IV. D8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9984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伦理与国际事务评论 第一辑 ·

大国发展与国际道义

熊文驰 马 骏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7.75 插页 4 字数 294,000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877 - 1/D · 1611

定价 35.00 元

序 言

秦亚青

上海外国语大学伦理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伦理与国际事务评论》第一辑《大国发展与国际道义》即将出版,苏长和教授邀我写序。我对伦理学没有深入研究,所以底气不足,但仍欣然答应。原因有二,一是国际关系伦理学还是一个新生的研究领域,在国内更属刚刚起步,但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并会开出一方富有新意的学问天地;二是我相信伦理道德不仅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国际关系中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随着世界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伦理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对国际关系伦理的研究也必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中国国际关系领域拓展国际关系伦理学方向,本身就是对这个学科的一大贡献。

—

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学问,是以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本身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伦理学的许多概念逐步形成,学科也渐渐完善,成为哲学家探讨人类社会的重要领域。西方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个体本位的社会,个人利益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但就社会而言,道德又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因此,西方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讨论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在今天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辩论中,我们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到不同观点的差异和不同思想的争鸣。

中国的伦理思想更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底,厚德载物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以“仁”为核心的中国道德体系,“仁”被构建为中华道德的最高境界,仁义礼智信成为中华道德的集中体现。历代儒家强调道德至高无上的重要意义,杜维明教授在《中庸洞见》也以

西方的研究方法，对《中庸》进行了结构性解读，认为中国社会的理想类型是信赖社会，信赖社会的基本行为体是“君子”，信赖社会的维系要素是道德。这样以来，修齐治平也就有了逻辑上的高度关联。

社会是不能没有道德的。但是，是否存在普适道德？或者说是否存在人类共同的伦理准则？这是一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富有争议的问题。我想是有。比如中国文化中的民本意识、和谐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品行，再如西方文明中的人的权利、人的安全、人的尊严等等，大概都可划归具有普适意义的范畴。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似乎总是一对矛盾，谈普遍则与特殊对立，谈特殊则无普遍之余地。普遍和特殊这一偶对却总是在互补，普遍可以被特殊所接受，特殊也可以升华到普遍。特殊文化养育的道德规范成为普适价值的个案不胜枚举，这里面包含的可能正是这种互补的辩证法。

国际社会也是不能没有道德的。但是，是否存在国家和个人都需要遵循的道德？这又是一个国际关系学领域富有争议的问题。我以为也是有的。应当承认，国家和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道德原则。比如摩根索就清楚地分离了国家的道德和个人的道德。但是对于普适道德，国家和个人则都是应该遵守的。否则我们永远只会深陷霍布斯丛林，我们也只能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遵循最基本、最具普适意义的道德原则，恰恰是人类社会所不同于动物世界的定义性标志。试想一个大国，总是怀抱霸权的冲动，去征服、去控制、去实现一己之利，恐怕终究是要碰壁的。道义责任是大国永恒的思考和困惑，只有铁肩担道义的大国才能成为国际社会的中坚。

二

伦理学思考的是“应然”问题。既是应然，使之应然的想必是人，使之变化的也会是人。国际关系伦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际道德规范，国际道德规范正是身处国际关系实践中的行为者建立起来的。比如当今被几乎所有国家接受的《日内瓦公约》。在杀戮和虐待战俘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代，瑞士人亨利·杜南几乎是凭借着最初的一己之力，说服各国的将领，让他们认识到为什么不应当残酷地对待战俘和交战国平民。从一人的人道主义到普遍的人道主义就这样确立起来，不但被各国民众所认可，也被各个主权国家所接受，成为一种无可置疑的普适道德原则。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当一个人的理想不

被社会所接受的时候,他就是在上演堂吉诃德的悲剧;但是当一个人的理想被社会民众所普遍接受的时候,这个理想就会成为普适的道德原则和伦理准则,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完善。

人是能动性极强的理智的行为体。人从来不会满足于自身的现状,也就是不会满足于“实然”境地。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一个根本不同就是人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思考,通过不断的行动和互动,总是要向着一个更加理想的境界迈进。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他们就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努力,界定应然,改变实然,制定规则,实践道德。在主流国际关系学界,且不说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学者,即便是被视为不重视道德原则的现实主义学者,也是不能避开道德对他们的影响。比如,现实主义考虑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战争。一方面,许多现实主义学者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他们有意无意地认为战争是非道德的,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所以,无论是均势原则还是战略平衡,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试图通过人的能动作用制止战争的发生。如果说和平是一种普适道德的话,以权力政治的法则制止战争可能恰恰是现实主义背后的道德意识或潜意识。当摩根索将其著作《国家间政治》的副标题定位为“权力斗争与和平”的时候,他就试图表述“权力斗争”的实然,实现“和平”的应然。

所以,无论是现实主义的均势秩序,自由主义的制度秩序,还是中国提出的和谐秩序,都有着深刻的道德背景和价值语境。在任何社会中,包括我们所在的国际社会,道德是无所不在的,道德和社会是共生共存的。

三

当今的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历史性转型。随着冷战的结束,大国合作开始多于大国对抗。同时,跨国性、全球性问题越来越成为危及整个人类安全的重大威胁。随着时代的发展,伦理研究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学界的重视,国际关系学界对伦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国际政治伦理学也成为一个新的并且具有很大潜力的研究领域。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重新发现伦理学是从冷战结束开始的。二战之后、冷战期间,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导理论。其后,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重大理论纲领。由于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的理论核心都是理性,所以对于伦理的关注都不充分。国际关系领域的伦理学研究多是针对战

争伦理这一实际问题展开的。20世纪90年代,自国际关系研究出现“建构主义转向”以来,规范明显成为研究的重要议题。几乎是在同时,国际伦理研究也开拓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如今,粗略地搜索一下文献就可以发现,许多将伦理学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著作,包括专著和教材,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并在进入21世纪之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剑桥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系列丛书中Terry Nardin和David Maple主编的《国际伦理传统》(*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是很有分量的一部开拓性著作,比较全面地梳理了不同理论对国际伦理的思考,既讨论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伦理思想,也讨论了法哲学和伦理学的渊源关系,所以被称为“第一部全面研究不同伦理传统是如何思考国际事务中的重要道德问题”的著作。1998年《千禧年》杂志出版专辑,题名为《伦理与国际关系》(*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后出版成书(Palgrave Macmillan, 2001),进一步推进了国际关系学和伦理学的结合。2002年Neta Crawford的学术专著《论题与世界政治的变化》(*Argument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则是一部重要的研究型著作。她提出了一个严谨的研究框架,以废除奴隶制、去殖民化等为案例,表明伦理论题以及辩论过程与军事实力等物质性要素一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可以改变世界政治。这部著作已经不仅仅是梳理文献和厘清概念,而是对国际伦理进行深入地研究,标志着国际伦理研究的深化和日趋成熟。其他著作,比如《国际伦理:概念、理论与全球政治中的案例》(*International Ethics: Concepts, Theories, and Cases in Global Politics*, Rowman and Littlefield, 第二版, 2005);《伦理与国际关系》(*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ley-Blackwell, 第二版, 2008);以及《伦理与国际事务读本》(*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 Reader*,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第三版, 2009)等一系列著作和教材的出版和再版使国际关系伦理学研究更为深入、更为广阔。以往,伦理研究往往集中在国际军事领域。现在,国际伦理研究已经具体到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并结合全球治理展开,比如国际经济伦理、生态伦理、气候伦理、女性主义伦理等等,都成为国际关系伦理学的研究方向。

这种关注恰恰与主流国际关系研究本身开始高度关注“国际规范”联系在一起。从1990年代开始直到如今,国际关系学界对规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视,有人甚至提出国际关系研究的“规范转向”。学者开始对规范的生成、传播机制、接受条件等一系列的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其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对具

体规范的实证研究。2005年,《国际组织》杂志发表专刊(*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 Fall 2005),讨论国际规范的传播机制问题。虽然国际规范研究不能与国际政治伦理学完全画等号,“规范”也不全是道德范畴的东西,但是有一部分研究议程和课题是重合的。这种重合说明了一个问题,在世界政治进入全球化时代并出现重大转型的时候,道德规范和思想理念对于国际关系的重要意义再次突显出来。

四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道德伦理的研究严重不足。从学理层面上说,学术期刊上关于国际伦理研究的成果寥若晨星,国外国际伦理研究的重要著作也没有得到充分的翻译引进。基本的概念和研究体系仍然没有清楚的界定,西方国际关系伦理学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完全厘清,中国伦理传统对国际关系的意义也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与发掘。从实践层面上讲,中国正在迅速发展时期,很快就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在上升、影响力在增强、责任也就随之增加,涉及国际道义的问题也就越来越会成为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而,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会给世界带去什么样的道义理念?又会表现出怎样的道义行为?所以,对国际道德伦理的研究不足不能不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这本《大国发展与国际道义》就尤其值得关注和重视。本书的编者和作者敏锐地抓住了国际伦理这一重要议题,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对国际伦理的讨论。从大国的发展与国际道义这一问题切入,更表现出这部文集的现实意义。各位作者从伦理学和国际关系学结合的视角,审视了民主和平、文明冲突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大命题,探讨了大国的利益和责任。中国的道义观念和规范发展被置于现代思想和话语体系中加以分析。作为国内国际关系学者第一部比较全面地讨论国际关系伦理问题的文集,无疑为中国国际关系伦理学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国际关系伦理学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通过学界同仁、尤其是年轻学者的不懈努力,一定能够成为姹紫嫣红、奇葩竞芳的学术园地。

目 录

序言 /秦亚青 1

专题 大国发展与国际道义

“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 /石 猷 1

民主和平与战争状态问题

——再谈“民主和平论”与现实主义之争 /熊文驰 18

国际关系伦理中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

——以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为例 /张 旺 45

国家利益的伦理之维 /李开盛 61

大国崛起与政治家的责任 /左希迎 81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

——基于《左传》的研究 /黄宇兴 陈 瑕 92

道义观念与国际体系的变迁

——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例 /王日华 132

研究论文

哈贝马斯“普遍法律状态”论评析

——兼论西方语境下世界正义理论的结构性矛盾 /熊文驰 150

■ 大国发展与国际道义

权力·权威·责任

——马克斯·韦伯国际关系思想浅析 /姚自强 石斌 164

国际政治中的审慎原则

——思想源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刘丰 左希迎 178

经典译丛

国际政治哲学何以必要？

——《国家间正义——论权力与和平的道德基础》序言 /托马斯·庞格尔 201

康德、自由主义与战争 /肯尼斯·沃尔兹 214

设身处地：约翰·赫茨、安全两难与核时代 /尼古拉斯·惠勒 232

思达读书会

回归何种政治？

——读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 /熊文驰 254

书评编译 /259

Contents

Preface	<i>Qin YaQin</i>	1
---------------	------------------	---

Disquisition: Rising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Daoyi

The Moral Appeal of Amoral Political Theories: The Paradox of Realist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Ethics	<i>Shi Bin</i>	1
Democratic Peace and the State of War: review on the debate between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and realism	<i>Xiong Wenchi</i>	18
Universalism and Particularism in International Ethics: An analysis based on cosmopolitanism and communitarianism	<i>Zhang Wang</i>	45
The Ethical Dimens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i>Li Kaisheng</i>	61
Rising power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man	<i>Zuo Xiying</i>	81
Inter-state Interventions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476 B.C.): A Study Based on Zuo's Commentary (Zuo Zhuan)	<i>Chen Qi and Huang Yuxing</i>	92
Morality Ideas and the Transi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Chinese Experience during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s	<i>Wang Rihua</i>	132

Research

Critique on Habermas' theory of "General legal conditions"	<i>Xiong Wenchi</i>	150
---	---------------------	-----

■ 大国发展与国际道义

Power,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An Analysis of Max Weber's Thought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Yao Ziqiang and Shi Bin	164
The Principle of Prude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ources of Though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Practice	Liu Feng and Zuo Xiying	178

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

Why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ecessary (Chinese Version)	Thomas L. Pangle	201
Kant, Liberalism, and War (Chinese Version)	Kenneth N. Waltz	214
To Put Oneself into the other Fellow's Place': John Herz,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Nuclear Age (Chinese Version)	Nicholas J. Wheeler	232

SIDA Reading Club

Return to What Kind of Politics: to Reading Chantal Mouffe's <i>Return Of The Political</i>	Xiong Wenchi	254
Book Reviews from world Journals		259

“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

石 斌^{**}

【内容提要】 作为一种国际(关系)伦理传统,现实主义以其“非道德”政治论著称,但这一特征经常被夸大或误读。绝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并不信奉犬儒哲学,他们始终将伦理问题置于突出位置加以讨论,且本质上都不乏基本的道德关注,只是伦理立场的支点和道德诉求的对象与其他传统有所不同,具体的思想家在伦理问题上也有极端与温和的差别。然而,片面的人性论和僵化的国际社会观与复杂多维的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非道德”论的学理立场与“人”和社会的基本道德需求之间的冲突,又使他们陷入无法排解的困境。本文简要梳理几位现实主义理论大师的国际伦理思想表明:国际政治思考之所谓“价值中立”的企图,在理论上是徒劳的、在实践中是虚幻的。面对当代各种全球性问题,政治与伦理的二元对立这种现实主义的极端化形式,其“非现实性”并不亚于作为现实主义伦理观之对立面的“道德主义”。

【Abstract】 As a tradition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Realism is well-known for its claim about the amoral nature of politics. In fact, the great majority of realists are not promoting moral cynicism. They not only pay great attention to ethical issues in their construction of theories but have moral concerns at heart about concrete foreign affairs. They differentiate themselves from other traditions mainly by their stress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morality of states and that of individuals. But their views on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are both one-sided and rigid, often inconsistent with the changing reality, and their creed about the amorality of politics is also inconsistent with the moral needs of human beings and society. All this makes them run into a dilemma from which they cannot extricate themselves. Taking some of the greatest realist thinkers as examples, this paper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t is impossible as well as unreasonable to be value-free in the thinking and deal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widely embraced dichotomy of politics and ethics, if goes to extremes, is no less unrealistic than moralism in a world burdened with numerous global problems.

* 本文原载《欧洲研究》2002年第1期,在此感谢授权转载。

** 石斌,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一

政治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乃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在国际政治领域，以“非道德”政治论^①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在不同语境又曰自由国际主义或理想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②

如果对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作一个简洁的概括，不妨说它有“四论”：悲观的人性论、国际体系无政府论、强权—利益论、“非道德”政治论。前两者被视为当然的理论前提，后两者则是它们的逻辑结果。“强权—利益论”^③与“‘非道德’政治论”其实也互为因果。伦理在国际政治中的位置问题成为现实主义思想家始终关注的焦点，这一点绝非偶然。因为，人性之“善恶”基本上是个无法从确证的先验命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在经验上一般则不难证明。更重要的是，从国际关系思想史的角度看，现实主义每次卷土重来，都是对“理想主义”（其实质在前者看来即“道德主义”）的反动，它始终是通过对“道德主义”的批判来彰显自身的伦理立场。现实主义的根本观点，一言以蔽之，即国家的自我利益优先于任何道德原则，权力优先于正义。可见现实主义者在理论上所面临的实际上首先是一个伦理问题。可以说，离开这个论题，现实主义特别是

① “非道德”(amoral)，指政治领域与道德无关，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immoral)。总体而言，“非道德”论确实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尽管如本文所示他们的具体立场并不完全一致，而且有的人（例如凯南）尽管实质上强调政治的“非道德”性质，却声称并不主张“非道德”（更遑论“不道德”）的外交政策(George Kennan,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64:2, Winter 1985—1986, pp. 205—206)。

② 当然，根据不同的判断标准和观察角度，还有其他许多可以称之为“伦理传统”的思想流派，例如迄今最有影响的一本国际伦理思想史著作就论述了十余种“传统”，这还不包括非西方世界的思想资源（参见 Terry Nardin and David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但该书的标准过于含糊，例如将契约论视为一种“国际”伦理传统就有点笼统，因为同是契约论者，康德的思想独树一帜，代表着另一大传统，与霍布斯等人显然不同。关于康德国际关系思想的基本轮廓及其伦理取向，参见拙文：《康德国际关系思想刍议》，《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

③ 所谓“强权—利益”，即摩根索所说的“根据权力来界定的利益”和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帝国主义的信条：“正义即强者的利益。”后者更清楚地表达了政治现实主义的伦理内涵。参见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4th edn. New York, 1967, pp. 3—2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米洛斯人的辩论”，第412—421页。

经典现实主义^①的理论大厦几乎无从建立,因为他们的若干论点都是就此展开的(例如摩根索“六原则”的后三条都与此有关),尽管其目的是“证伪”(即否定或贬抑道德因素的作用)而非证明。

然而,现实主义思想家们对“非道德”政治论的具体阐述却颇多歧义。最极端的立场认为国际政治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更多的人则主张“道德相对论”,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②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最流行的观点是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认为“国家生存”、“国家利益”或所谓“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甚至是“最高的道德”;^③较温和的观点则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的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④实际情况当然远为复杂。下面只能以几位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为例,对现实主义国际伦理观的基本轮廓和主要缺陷作一简要论述。

^① 所谓“经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 其中 classical 一词本身有“古典”、“经典”、“传统”、“人文”等含义),论者在使用时实际上有多种含义:(1)狭义:相对于近现代(含当代)现实主义而言,即“古典”现实主义,如修昔底德等古代思想家的现实主义;(2)广义:相对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新(结构)现实主义”而言,即“传统”现实主义;(3)也有人用来特指二战后以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其实他们在命题和方法上与“传统”现实主义并无根本区别,故本文采用更常见的广义。此外,“传统”现实主义的“人文”特色与新现实主义的“(社会)科学”取向的差别也很明显。

^② 例如卡尔认为“那些据称是绝对、普遍的原则”不过是“在特定时间内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释基础之上的国家政策的无意识的反映”。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London, 1946, p. 87; George Kennan, *Realit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1954, p. 47.

^③ 用特赖齐克的话说:“国家本身即是一种道德力量,而且是一种崇高的德行。”“判断国家的行为不能用适用于个人的标准,只能用根据国家的本质和根本目的而设定的标准”(转引自 Nardin and Mapel,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p. 98);更极端的说法是:“政治家被授权维护国家的生存,此即最高的道德律令”(Robert Osgood and Robert Tucker, *Force, Order and Justice*, Baltimore, 1967, p. 304);摩根索则表述为“(政治)审慎是最高的美德”,国家生存是一种“道德责任”或“道德命令”,异曲而同工。(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 10, 557; *Human Right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73, p. 13.)

^④ 斯派克曼指出,“寻求权力不是为了实现道德价值;道德价值则可以用来帮助获取权力”;摩根索则认为,“慷慨与理想主义的政策”,只有当它与国家利益不冲突时才能推行。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n'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1942, p. 18; Hans Morgenthau, “The Primacy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e American Scholar*, 18:2, Spring 1949, p. 212.

二

追溯现实主义的思想源流，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是较早的两个典型。前者相对温和一些，后者则更为彻底。以他们为坐标，可以给后世的现实主义者以大致的定位。

一般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米洛斯人的辩论”一章集中体现了修氏的国际伦理思想，其核心即雅典使者在论辩中所阐述的一个古老命题：正义即强者的利益。雅典使者还明确指出了国际政治的“非道德”性质。^①

这篇精彩的历史对话确实生动地反映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国际关系哲学的根本冲突。但《战争史》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其次才是政治哲学著作，不能将作者笔下的雅典帝国主义的逻辑完全等同于作者本人的思想。修昔底德的国际政治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二元结构，他强调生存与安全优先于道德原则，但并不否认道德原则的存在及其价值。他固然不同意“正义的就是强大的”，但也不认为“强大的就是正义的（强权即公理）”。对于极端的现实主义——在雅典那里表现为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他显然是有所保留的。对政治现实的某些重要侧面，能够清楚认知但并不轻易认可，这正是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利的分界线。米洛斯之辩的结局诚然是“强权”压倒“公理”的一个例证，但对雅典军队屠杀奴役米洛斯人的野蛮暴行的忠实记录，也间接传达了作者的道义谴责。联系有关雅典社会内部颓败并最终战败的历史叙述，修氏对雅典帝国主义的批判立场就更清楚了。正常人都有起码的道德需求，国家的内部凝聚力也有赖于社会基本道德共识的存在，而雅典长期推行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最终反过来损害了这个道德基础，结果派系倾轧、私欲膨胀、公益无着、民心惶惶，内部斗争直接导致西西里远征的惨败，并引发雅典内部革命和盟国的反叛。修昔底德明确指出，是雅典人自己打败了自己。^②在他看来，对外政治需求与对内道德需求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

如果说修氏的“非道德”论大致只限于国际政治的范围，马基雅维利则没有这个限制。以人性论与国际体系无政府论为理论前提，依据罗马帝国的历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卷，第412—421页。

②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卷，第141、第150—151页。

史经验，马基雅维利强调国家的首要目的是谋求生存以及生存所必需的权势，国家只能遵循自助逻辑，追求道德或意识形态目标则有悖“事物的条理”、有害无益，对于“条约必需遵守”这一国际伦理原则，也只能从需要而不是信用出发。^①他不仅肯定帝国主义是出自生存的需要，也无意强调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伦理规范。对于修昔底德面临的难题，马基雅维利提供的策略，一是欺骗与伪装，“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可以无需具备，必要时甚至不妨反其道而行，但却“极有必要假装具备”；二是慑服，“与其让人爱戴不如让人畏惧”。按照今天的标准，这已近乎愚民与高压政策。^②

为什么要“伪装”？显然因为人们一般都推崇这些品质。马基雅维利不能不承认，“它们是有用的”。他虽然怀疑普世“共同道德”的存在，却无法否认道德信仰乃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现象。所以他只能以国家为道德诉求的对象，紧接着就强调，手段的选择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国家生存的需要，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正确性。在他看来，最理想的政策选择当然是既合乎道德原则又能达到政治目的；两者不可得兼时——基于其理论前提他相信这更合乎常态——则选择后者；至于没有任何政治收益，反倒可能导致对内失去民心、对外损害必要的国际声望的政策行为，则理所当然应予摒弃，因为这既不合乎道德原则，也不合乎政治原则。简言之，君主可以行恶，却不必无端作恶。^③

总之，马基雅维利虽然力图摆脱道德原则对利益追求和政治权衡的约束，但并不否认、就其理论建构而言也无需否认伦理原则本身的价值，他所强调的只是利益或“需要”优先原则。他力图揭示政治自身的规律（摩根索所说的政治领域的“自主性”也不外这个意思），思考的重点在于政治“是什么”而不在于“应该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基雅维利本人的确并不比人们通常的理解更合乎“马基雅维利主义”。^④但他的现实主义仍然是比较彻底的，其国际政治和国际伦理观具有鲜明的结果主义和工具主义色彩。他几乎毫无保留地将“非道德”论应用于一切政治领域，更重要的是，他明确主张必要时可以“主动”采取“不道德”但却能达到政治目的的政策，这是后世大多数现实主义者所不敢轻易苟同的。

^① Nicc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 trans. Harvey Mansfield, Jr., Chicago, 1985, pp. 7—16.

^② Ibid., pp. 70—71, pp. 65—68.

^③ Ibid., pp. 61—82.

^④ 参见 Harvey Mansfield, Jr. 为其《君主论》英译本所写的前言, *ibid.*, pp. vii—xxiv.